

清平山堂話本校注

〔明〕洪楗輯 程毅中校注

中華書局

〔明〕洪 樞輯 程毅中校注

清平山堂話本校注

中華書局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清平山堂話本校注 / (明)洪樞輯;程毅中校注. —北京:中華書局,2012.2

ISBN 978-7-101-08446-7

I. 清… II. ①洪… ②程… III. 話本小說 - 小說集 - 中國 - 古代 IV. I242.3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1)第 269813 號

責任編輯:劉彥捷

清平山堂話本校注

[明]洪樞輯

程毅中校注

*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(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)
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
E-mail:zhbc@zhbc.com.cn

北京天來印務有限公司印刷

*

850×1168 毫米 1/32·18½印張·2 插頁·400 千字

2012 年 2 月第 1 版 2012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數:1-4000 册 定價:58.00 元

ISBN 978 - 7 - 101 - 08446 - 7

本書出版得到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資助

前言

宋元話本是中國小說史上的一座里程碑。魯迅《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》第四講《宋人之「說話」及其影響》說：「這類作品，不但體裁不同，文章上也起了改革，用的是白話，所以實在是小說史上的一大變遷。」（一）浦江清師曾作了進一步的闡述：「沒有宋元話本就沒有後來明代的擬話本小說、長篇的章回小說；沒有這些無名氏文人，就不可能產生施耐庵、羅貫中這樣偉大的小說家。宋元話本的重要地位即在於此。」（二）又說：「話本的發展為近代口語的文學奠定了基礎，開闢了文學語言的新路。」（三）這就充分說明了宋元話本的歷史地位和文獻價值。我們不能再引申一下，如果沒有《六家小說》和《三國志演義》《水滸傳》這樣的作品，就不會產生「三言」和《儒林外史》《紅樓夢》這樣的名著，甚至「五四」以後的白話小說，也不會如此得到廣大讀者的認同，因而發展得較為順利。

《清平山堂話本》是現存宋元小說家話本中最接近原貌的版本，也有不少藝術水準較高的作品。它比講史家的話本題材更寬廣，語言更通俗活潑，收了不少宋元話本的代表作，為近代口語化的文學開闢了道路。它在中國小說史上有重要的歷史文獻價值。可惜

的是原書已經散失了大半，剩下的只有二十九篇殘缺不全的作品。

《清平山堂話本》原名《六家小說》，是明代嘉靖年間洪楸清平山堂編印的。據晚明祁承燦《澹生堂藏書目》卷七小說家記異門著錄，分別題名為《雨窗集》《長燈集》《隨航集》《欵枕集》《解閑集》《醒夢集》，每集十卷，共六十卷。清人顧修《彙刻書目初編》著錄與之相同。從六集各具書名看來，稱為「六家小說」是比較合理的。但田汝成《西湖遊覽志》（嘉惠堂本）卷二湖心亭條引作《六十家小說》，《趙定宇書目》著錄亦作《六十家小說》（古典文學出版社一九五七年影印本一九三頁）。這只是對六個集子的總稱，其實是應該分別稱各個集子的正名。晁璫《寶文堂書目》子雜類只著錄了《隨航集》一種，下注十種。其餘都是散錄單篇，像是早已單本流傳，或者可能還是洪楸彙刻之前的舊本，如現存殘頁的元刻本《紅白蜘蛛》，在《寶文堂書目》裏就有《紅白蜘蛛記》的記錄。日本學者中里見敬教授根據版面有補刻的跡象，得出結論說：在清平山堂刻本之前，已有小說舊本的存在（四）。這是可信的。現存《雨窗集》中《錯認屍》入話「世事紛紛難竟陳」，「竟」字刻在行外，原為墨丁，大概是重印時不便挖改，才在行外補刻的。《警世通言》改名為《喬彥傑一妾破家》時却改作了「訴」字，可能馮夢龍的底本還是有墨丁的初印本，「竟」字還沒有補出。又如《洛陽三怪記》中挖改的字很多，像是在利用舊版重印時改的。更令人驚詫的問

題是《欵枕集》的《羊角哀死戰荊軻》殘存的第四頁，第一行末兩字「不而」，第二行末兩字「頭半」，第三行末兩字「飢賢」，無法讀通。原來第一行末缺了一個字，據《明言》應是「肖」字，讀成「不肖弟」。「而」字應屬第二行，讀成「點頭而答」；第二行「半」字應屬第三行，讀成「半飢半飽」；第三行「賢」字應屬第四行，讀成「楚君招賢」。下面第九、第十行還有錯字，也是如此。文學古籍刊行社影印本對此頁已作了挖改，但沒有說明，第一、二行還沒有改正。（譚正璧、石昌渝兩先生的校本已有所校正，但不徹底，又沒有說明依據。）幸蒙北京大學圖書館古籍部允許我校讀原書，才驗證了並非裝裱錯行，還是原本有誤。想來是翻刻所據的底本已有殘損，造成了末一字位移的錯版奇跡。否則它的底本可能是活字版，因散架而造成末字移位了，不過這種可能性是很小的。總之，從版面的墨丁、缺字、錯字看，清平山堂所藏的底本就是殘缺多錯的劣本，或者竟是利用殘損的舊版重印的。

清平山堂刻本《六家小說》久已未見流傳，一九二八年古今小品書籍印行會據日本內閣文庫所藏殘本影印時，考證出原為清平山堂刻本，因不知集名，就定名為《清平山堂話本》。後來馬廉先生又從寧波收購到了《雨窗集》和《欵枕集》的殘本，共十二篇，又據以影印，合稱《雨窗欵枕集》。阿英先生又收藏了《翡翠軒》和《梅杏爭春》兩篇的殘頁，從版面看也是清平山堂刻本，但殘缺過甚，無法整理，只能作為存目附錄了。一九五五年文學

古籍刊行社把《清平山堂話本》和《雨窗欹枕集》合併影印，仍用《清平山堂話本》為書名。這個版本通行已久，流傳很廣，但影印中描改失誤不少。現在以古今小品書籍刊行會影印本和馬廉先生影印本合為一本，加以校注，書名也不宜再改為《六家小說》或《六十家小說》了。

洪楸，字子美，錢塘（今浙江杭州）人，生活於明嘉靖、隆慶年間。出身於書香門第，是藏書家而兼出版家。刻印有《新編分類夷堅志》《唐詩紀事》《路史》等書。丁申《武林藏書錄》卷中有簡明的記載：「楸，字子美，蔭詹事府主簿，承先世之遺，縹緇積益，餘事校刊，既精且多。迄今流傳者如《路史》，見於《天祿琳琅》，稱其校印頗佳，深於嗜古。《文選》見於《平津館鑒賞記》，田叔禾序稱其得宋本重刊，校讎精緻，逾於他刻，且文雅有足稱者。」^{〔五〕}洪楸刻書能注意到民間的俗文學，還是難能可貴的。《六家小說》書中錯漏很多，顯然他不屑於費心校勘。但是它恰好保存了許多民間說唱的本來面目，保存了不少宋元時代的生活面貌和語言特徵，成為小說史和漢語史的寶貴史料。

話本出於民間說話人和書會才人之手，有的出於口耳相傳，記錄抄寫中錯亂很多。傳刻中又有隨意刪改的現象，到了晚明馮夢龍等文人手裏又被逞臆修改，就湮滅了許多原著的痕跡。因此話本的斷代考證，成為小說史上的一個老大難問題。多年來，有人從

某些跡象考證，否定了某些作品是宋人話本；也有人從某些現象考證，肯定了某些作品的年代。但如果對今本作全面的考察，就會發現有許多複雜錯綜的現象。正如近代漢語學家劉堅學長所總結的：「《清平山堂話本》和『三言』等幾部重要的話本集又是明朝人編刊的，其中雖不乏初作於宋元的舊篇，却已經過了明人修改而加進了明朝的語言成分。……『話本』語言層次上的這種複雜性給我們利用這部分資料增加了困難。」^(六)他又具體指出，《清平山堂話本》「二十九篇中有三篇是明朝人的作品，其餘都是宋元人之作」^(七)。以往我在校注宋元話本時，曾得到劉堅學長的許多幫助，現在我只能在他的遺著中找一些材料來支持我的考察了。在此對他深表懷念和感謝。

小說史的學者比較謹慎，對話本的斷代，有許多不同的看法。如對《清平山堂話本》作過全面校勘的石昌渝先生，就認定宋元作品只有十七篇^(八)。而對《六十家小說》作了綜合研究的常金蓮女士，則認定宋元作品共有二十三篇^(九)。這個問題值得深入探討。主要一點是除了可以肯定為宋元作品的篇目之外，能不能都確定為明代的作品呢？

《清平山堂話本》中有好幾篇口語化程度很低的簡本，語言的時代性極不明顯，而且雜糅了元代前後的文字特徵。最明顯的例證是「元」字的改不改「原」，能不能以此作為斷代的標準呢？

元明之間，一個最明確的標誌是「元」字的使用。明李詡《戒庵老人漫筆》卷一《國初諱用元字》說：「余家先世分關中，寫吳原年、洪武原年，俱不用元字。想國初惡勝國之號而避之，故民間相習如此。」^(一〇)沈德符《萬曆野獲編》補遺卷一《年號別稱》說：「又貿易文契，如吳元年、洪武元年，俱以『原』字代『元』字，蓋又民間追恨蒙古，不欲書其國號，如南宋寫『金』字俱作『今』字。」^(一一)清顧炎武《日知錄》卷三十一《元》條又說：「元者，本也。本官曰元官，本籍曰元籍，本來曰元來。唐宋人多此語，後人以原字代之，不知何解。……或以爲洪武中臣下有稱元任官者，嫌於元朝之官，故改此字。」^(一二)

我們也曾利用這一個區別來判斷元以前作品的年代。《清平山堂話本》裏絕大多數地方都用「元來」一詞，但有五篇作品用了七次「原來」（參看中里見敬文中引佐藤晴彦的統計^(一三)）。我們能不能就此判斷這五篇是明代作品呢？顯然不能。因爲在同一篇裏也是「元」「原」並用，更大的可能是明代人改而未盡。再說，明代的書手也可能沿襲舊習而用了「元」字，不會到洪武元年開始就一律改用了「原」字，也可能在傳抄傳刻中對前代作品已經隨手改成了「原」字，所以「元」字可以作爲早期作品的例證，還不能作爲惟一的標誌。值得注意的是七次「原來」中六次見於《雨窗集》卷上，似乎有編印較晚的跡象。

我認爲既不能肯定爲元代以前，也不能肯定爲明代以後的，不妨存疑爲好。但是話

本作為民間說唱文學的史料，具有傳承性和變異性的特徵，我還是盡可能地探索了一些文獻和故事情節的淵源，舉出了一些語言文字複雜性的例證，藉以說明它是「累增式」或「世代累積型」的小說。

我覺得語言學家根據漢語史的研究成果判斷作品的年代，是科學性較強的方法，值得我們借鑒。當然，還要結合歷史和文獻的研究。經過多年的考察，我認為《清平山堂話本》裏包括了宋、元、明三代的作品。其中大部分可以確認是宋元的作品，但曾經後人有意的修訂或無意的誤寫，出了一些矛盾的現象。有人看到個別的語詞和名物制度的特徵，就確定了作品年代的下限，但忽視了其他方面的反證，這是不全面的。根據多年來多位學者從各個不同方面研究，基本上認可了一個結論，就是早期話本是世代累積型的產物，不是一時一人的作品。《清平山堂話本》就是這樣的一本小說集。例如《簡帖和尚》一篇，前人大都認為是宋人作品，許政揚先生《話本徵時》從「如今叫做『聯手』，又叫做『巡軍』」兩句話，考證為元人所作^{〔四〕}。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發現。然而從整篇故事看，話本裏却有很多宋代人所用的語詞和文字。例如話中用了不少助詞「底」字，這是常見於唐宋文獻的，在《朱子語類》和《五燈會元》裏可以找到許多例證，到元代就逐漸被「的」字取代了，到了《古今小說（喻世明言）》裏就都改成了「的」字。還有話中說到「你懣不敢領他」、

「見他懣人去」的「懣」字，也是宋代人所用的字，元人多用「每」字，明人多用「們」字。又如主人公皇甫松，開頭說他「本身是左班殿直」，是宋代的武職官名。政和二年（一一二二）改名成忠郎，而以內侍高品改稱左班殿直。小說人說皇甫松是「左班殿直」，沿用的還是政和二年以前的官名，元代的說話人未必會按典章制度來評定他的職稱，應該是傳承祖本而來。再如說「皇甫殿直官差去押衣襖上邊回來」，這是武官左班殿直的一項任務。邊防軍的衣襖由東京押送去，這是北宋時的制度。北宋人所著《楊文公談苑》記載：「國朝之制，文武官諸軍校在京者，端午、十月旦、誕聖節，皆賜衣服。其在外者，賜中冬衣襖，遣使將之。」^{（二五）}李燾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卷一〇四記載宋仁宗的詔令說：「押賜外州軍衣襖，舊皆差伎術官，比來宗室、戚里多以親屬干請，至有諸司使、副及京朝官爲之，煩擾州縣，自今一切罷之。」^{（二六）}恐怕元代的說話人也未必能熟悉這些制度。話中還提到了許多東京的地名，可見是「京師老郎傳流」的節目。因此我認爲《簡帖和尚》基本上是宋代的作品（詳見本書的注釋），甚至它的上限還在北宋時期，話文中「聯手」「巡軍」的解釋則是元代說話人的插話。

另如《戒指兒記》一篇，許政揚先生從商人子弟可以點報朝中駙馬的情節，考證爲明代的作品，這是很敏銳的發現，的確可以論定了。小說基本上是明代人寫成的，但是也要

注意到這個故事的母題流傳已久，宋代就有西湖庵尼的故事^(二七)，就是它的前身。篇中也有一些較早通用的語言成分，如「告」「度與」「靜辦」等，還是宋元時期通行的語詞，還有較早通用的文字如「那」「挪」、「卓」(桌)等字。它可能也有更早的基因。如陳太常的人名或許由宋代太常卿的官名訛傳而來，而明代還有同出一源的傳奇小說《寶環記》^(二八)。從大體上說，《戒指兒記》寫定於明代是可以肯定的，但也不會是一人一時之作。

我們只能從時代特徵的多少，來探討作品大體上寫定於哪個時期。除了叙明代故事的《風月相思》之外，其餘二十八篇都可能有元代之前的成分，只是多少不同。有些時代特徵極少的只能存疑待考。有的已徹底改寫的如《喻世明言》裏的《衆名妓風流弔柳七》則只能算是明人作品了。我把有關問題放在各篇第一條注文中加以說明，疑問較多的只能提出一些跡象供讀者參考。

《清平山堂話本》的情況比較複雜，不僅收入了宋、元、明三代的作品，而且也包羅了文白並存、繁簡各異的版本。從題材來看，有漢代的司馬相如、李廣、馮唐、范式、張劭等人物，素材大多出自《史記》《漢書》，有些文字就抄自漢代的史書，時代的特徵很不明顯。有的摘錄自傳奇小說，如《藍橋記》基本上是裴鏞《傳奇·裴航》篇的摘要，應該說還是唐人的作品，只有一兩個字是後人改筆，加上首尾一首入話詩和兩句散場的留文，我們可以

從中推測它大概是說話人用的提綱。《刎頸鴛鴦會》的頭回摘錄自皇甫枚《非烟傳》，也是唐人所作，我們就不能據以尋找宋元或明代的語言文字，也不必用《通言》的文字來作校勘。《風月相思》顯然是明代人寫的「詩文小說」，全篇文言文，與《剪燈新話》等書完全一致，但是開頭又加了四句入話詩，看來也可能是說話人準備的「掌記」，但全篇都是明代作品的風格。還有一篇僅存殘頁的《翡翠軒》，性質也和《風月相思》相同，寫的是元代故事。因為首尾都已缺失，更無法尋找時代特徵了。

《清平山堂話本》裏錯別字、異體字很多，其底本應是傳抄本或拙劣的坊間刻本。然而其原創者却不一定水準很低，有的作者大概是有一定文化修養的書會才人。只是刻印者却往往粗製濫造，弄得錯誤百出。不少話本引用了李煜、柳永、蘇軾、辛棄疾的詞，有些詩詞賦贊寫得還比較工整雅致。正如羅燁《醉翁談錄·小說開闢》所說的：「幼習《太平廣記》，長攻歷代史書。」論才詞有歐蘇黃陳佳句，說古詩是李杜韓柳篇章。」比之清代說書的話本《飛跔子傳》《清風閣》《龍圖耳錄》《小五義》等，却顯得文雅得多，保持了一點雅俗共賞的文風。這可能是宋元時期低層文人由書齋走向瓦市的結果。宋元之際的王六大夫、朱桂英、丘機山等就是他們的代表。在這一代的說話人和書會才人中出現了施耐庵、羅貫中這樣的大家是完全可能的。《清平山堂話本》的結集，也給我們提供了文人和

藝人相結合的範例。明代文人又有了應試當官的出路，尤其是以代聖立言的八股制義作爲敲門磚之後，文人很少再和說話藝人相結合了。明代說話藝術逐漸衰退，因此沒有出現優秀的話本，這也是小說史上值得研究的課題之一。我們以元代作爲話本的一個時限，也是有原由的。

宋元話本的另一個問題是藝術水準的不平衡，是否體現了時代的先後。現存藝術水準較高的繁本如《簡帖和尚》《楊溫攔路虎傳》等如果是宋代作品，那麼晚出的作品是不是應該寫得更好呢？那些簡單粗糙的作品又是產生於什麼時代的呢？有人以《喻世明言》裏《陳巡檢梅嶺失妻記》《五戒禪師私紅蓮記》的修訂本爲標準，認爲後出轉精，藝術水準高的一定是較晚的作品。但事實未必如此，《清平山堂話本》裏有較精的繁本，也有較粗的簡本。它包容了不同水準的作品，我們不能簡單地從藝術成就的高低來判斷它的早晚。如成就較高的《簡帖和尚》倒是年代較早的作品。馮夢龍（或另有其人）不知道入話那首詞是辛棄疾的作品，就把它改錯了；把「道士頭」改成「罪人頭」，就犯了一個知識性錯誤。在這一點上，《簡帖和尚》原作者的知識結構比馮夢龍還寬廣一些，不過在傳承中却出了不少錯訛，留下了校勘的難題。

如前所說，宋元說話人和書會中有不少「才人」，從引用的書史文傳和詩詞歌賦看，確

有一些如《醉翁談錄》所說的「雖爲末學，尤務多聞。非庸常淺識之流，有博覽該通之理」。書中的許多錯別字、異體字，大多是在記錄、傳抄、傳刻中造成的。從這一點，可以推測其中有說話人口耳相傳的語錄本。明刻本的《金瓶梅詞話》等書，也可以作爲旁證。此外，還有刻書坊肆意刪節的問題，如元刻本平話《三分事略》和《元刻雜劇三十種》那樣的版本，就都是節本。《清平山堂話本》裏收了不少提綱式的簡本，只是說話人的資料。如《藍橋記》那樣，根本不能體現宋元說話的藝術水準，但還可以用作小說史的一種史料，爲《醉翁談錄》的《小說開闢》增添一個篇目。

有人只把一部分提綱式的簡本看作宋元作品，從而論定「三言」裏的繁本都是明代人的修訂本甚至定爲明人所作。這也是不全面的。一則《清平山堂話本》裏已有一部分成就很高的繁本，可以定爲宋元作品。二則「三言」裏原注爲「宋人小說」或「古本」的，其語言文字的特徵還可以與《清平山堂話本》作互證。這正是《清平山堂話本》的文獻價值所在，也是我們重視它的原因。

歷史現象，總是「說有易，說無難」。宋元時代常見的語言現象，不能說到了明代一下子就消失了。所以必須和其他書證聯繫起來作綜合的考察。某些口語成分很少的篇章，雖然我們也找出了一些早於明代的語言現象，但是並不敢確定它就是元以前的作品。這

就是我以前在編《宋元小說家話本集》時沒有把本書裏所有作品都收進去的原因。經過這幾年的繼續思考，對話本的斷代研究略有進展。有些問題不是寫篇論文所能說清楚的，所以乾脆對《清平山堂話本》全書做一次校注，提供同行學者討論。《清平山堂話本》裏錯字缺字很多，對於廣大讀者來說不是一個好版本，我只想提供一個基本保持原貌又比較可讀的版本，既大膽逕改了一些錯字，又做了詳細的校注，以免重蹈前人武斷臆改的覆轍。這樣的注釋不免過繁，讀者不妨先讀正文，有疑問時再查注文。

總起來說，大致有幾點可以談談：

一、《清平山堂話本》收集了許多宋元小說家的話本，有的可能經過明代人的修改，但改得不像「三言」那樣多，所以保存了較多的時代特徵。

二、《清平山堂話本》絕大部分是話本，但有些簡本只是素材和提綱，基本上還是資料。只能表明元代以前曾被用作說話題材，是一種小說史的有用史料。

三、《清平山堂話本》標誌着說唱文學的一個階段，其話本和講史家平話一樣，經歷了世代累積的過程。話本年代的上限和下限跨度很大，其下限直到嘉靖年間刻書之前，最晚的可能是《風月相思》，因為它講到了「倭夷有警」，因此命馮琛為靜海將軍，像是明代中期才有的事。說話這種技藝在明代並未中斷，只是往往改稱為說書了。直到明末的柳敬